

資政要鑑

第四卷



趙祿祥 主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第四卷

資政要鑑



《资政要鉴》编委会

主 编:赵禄祥

副主编:(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宝珠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建吉
王朝中	田人隆	李世愉	李学东
李雪屏	杨军强	杨祥峰	武四海
林吉旺	岳会仁	饶江山	黄晓东
商 传	梁海俊	谢保成	翁殿璧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刽	马宝珠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建吉	王政尧	王朝中	田人隆
刘 驰	李世愉	李华瑞	李学东
李雪屏	杨军强	杨祥峰	张小也
陈 爽	武四海	林吉旺	罗燕生
岳会仁	孟彦弘	赵禄祥	饶江山
黄晓东	商 传	梁海俊	谢保成
翁殿璧			

第四卷

社 会

本卷主编及撰稿人

主 编:马宝珠 商 传

撰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宝珠	王 剑	王善军
田人隆	史卫民	朱云鹏
朱杰军	刘小萌	李华瑞
李锡厚	岑大力	余同元
张永江	陈连营	林双木
罗燕生	定宜庄	赵世瑜
胡 凡	夏维中	徐庭云
徐淑惠	郭松义	商 传
彭丰文	董建中	赫治清

前　　言

一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前人的活动都可以成为后人的借鉴。自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后世读史者们的心目中，记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史为鉴。不过那时候的读史们主要都是历代的统治者，他们读史主要是为了知兴替，也就是主要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那时候人写的历史和读的历史主要也就是政治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也日益深入并且科学化了。于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又有了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种专门史。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与中国社会学同步发展起来的。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一批学者首先开始对中国历史与社会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他们从社会结构、家族与宗族、社区、社会群体等多方面对社会现实与历史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由此而去进一步找寻中国社会更深层面的问题，去找寻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中去找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

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学研究

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性质，中国社会史研究也一同受到株连，此后大约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几乎近于停滞。只有极少数学者还有锲而不舍地从事着与之相关的研究。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史方面。这种情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发生变化。

从 80 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当史学家们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过去所研究的那些历史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那里面还有如此广阔的领域过去未曾得到开发。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停滞了近三十年，但是从 80 年代初起到 90 年代末的二十年间，却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并且很快便与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研究接轨。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有中国人才真正最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

1995 年夏，首次中国海峡两岸社会史研讨会在风景怡人的北戴河海滨举行。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秦皇岛市会同台湾《联合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汇粹了相当数量的海峡两岸知名学者。当时任秦皇岛市副市长的赵禄祥同志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同时与到会的专家们共同研讨了《资政要鉴》一书的撰写内容，提出将中国社会史的内容作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以往任何一部史鉴书所没有的特点。当时赵禄祥同志主持的国史三鉴中的第一部《国史镜鉴》已经出版，第二部《治乱警鉴》尚未出版，待到《治乱警鉴》出版后，才集中人力撰写《资政要鉴》，已是三四年以后的事情了。

《资政要鉴》社会史卷是全书四卷中的一卷，它是将中国社会史作为史鉴的专门著作的首次尝试。根据全书主编的要求，本卷主要突出的还是一个“鉴”字。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部分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点，从而使它的历史借鉴作用更加显得突出了起来。中国社会史与以往的一般政治史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停留

在政治的表象之上，而是深入到了社会一切活动之中，并且从中可以找到许多政治表象的根源。它不仅可以与政治史一样去从史料中找寻答案，而且可以甚至必须从更多的方面如像社会田野调查中去找寻历史的答案。这不仅给史学工作者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也给予了史学工作者们更广阔的研究天地。二十年来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发展，为本卷的撰写提供了基础，使我们终于可以从透视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时找到那些真正值得借鉴的东西。

二

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脱离猿人时代而进入到原始社会时代，人类便开始了社会化的生活。从血缘部落群体发展到部落联盟，人类生活中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本卷便是遵循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远古先民们的足迹走进那至今仍然带有神秘色彩的原始社会之中。从此也便揭开了中国社会史的帷幕。

与世界脚步相同的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之后，中国社会也开始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也便是现在学者们正在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研究的时代。尽管目前的一些学者对这一段过去被习惯称之为奴隶社会的时代提出了异议，但是从这时候起，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开始进入了阶级社会，也就是文明社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人们最早从河南省安阳发现那些甲骨文开始，到现在已经一百年整了。正是这些甲骨片和考古工作者们对那些令人吃惊的商王大墓的发掘，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五千年前的那个人类社会。

从那个时候起，直到 1911 年清朝灭亡，这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一切社会化的活动便都是本卷所要展现的内容。

不过与政治史研究的情况相似，社会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材料问题，或者说它比起政治史来说，更加需要深入细微的史料，这于是也就必然给史学工作者们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史带来一定的难度。真正可以称之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还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社会变革时期。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这是中国先秦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充满生气地走上了当时的政治舞台，从而也使那时候的整个社会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这一时期最有表现力的社会群体当然首先是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诸子百家们，同时活跃于列国之间的还有那些商人群体。本书中对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没有能够给予适当的表现，确实是略显点不足。不过本卷所表现的主要是社会史上可资借鉴的问题，并非求全。

但是本卷中却独具特色地展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妇女、婚姻与家庭，并且从这样的一个侧面去着重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如何走出了周代宗法制度的帷幕。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但是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却是十分重要的。

自秦统一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统一为主体的时代。虽然在社会形态上与战国时代没有发生新的变化，但是由于统一局面的形成，社会问题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流民与徙民问题，全国或者区域性的灾害问题、社会上新的群体——游侠问题等等。这时候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仅带有时代特征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继秦汉以后出现的一段相对分裂的时期。门阀等级制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加之战争的频繁，南北朝社会出现了一种畸形状态。坞堡壁垒中的南北朝社区造成了以宗族、家族和等级体现的社会结构，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

世族，成为社会公理。一方面是流觞曲水间的文人集会，一方面是竞奢与尚俭的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独具特色的时段，这种极端化的社会现象为后人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借鉴，也使之成为后世引作掌故的最多的时代之一。

隋唐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所谓大唐盛世，以它融汇百川的气魄造就了外来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最成功的组合。隋唐时代最具代表性时代特征便是那时候空前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是时代发展的写照，也是开放的社会的硕果，这对于今天经历了改革开放成功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更能够从中得到借鉴。本卷隋唐部分另一个独具特色的内容是对当时生态环境的探讨。整体上看，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受到过明显的人为破坏，了解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对我们思考今天生态环境中的问题有着明显的教益，当我们居住的地球生态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程度的时候看一看历史上的生态状况，实在是值得人们深省的。隋唐时期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官制度形成阶段，科举制的出现，打破了世族政治的传统，也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旧有的等级构成，隋唐五代的社会阶层与官场社会从这方面给我们提出了明鉴。

宋代的政治特征是外实内虚。为了改变隋唐五代以来藩镇过于强大的弊病，宋朝实行了进一步的集权措施。与此同时文官在政治地位上的加强又使之进入到了一个理性时代。这样的政治特征与时代特征造成了两宋时期独有的社会现象。新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新的文风与士风，促进了以上层文人官员所倡导的宗族自救风气。不过这时候对于全社会来说，宗族的自救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反倒使积弱与奢靡并存的畸形现象最终葬送了大宋江山。

其实在当时与宋朝相对峙的辽夏金也都不同程度上存着一些社会问题。辽夏金宗教迷信的盛行便是这种社会问题一个侧面的反映。一个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是，当辽、夏、金与宋相对峙的时候，都各自表现出了求生发展的欲望，当各国间形成和平局面的时候，自身的社会问题也就相应而生了。最终历史安排元朝取代了他们。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时代，它虽然由蒙古族所建立，但是宋儒以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却对这个时代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元代蒙古、色目、汉、南人制度造成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但是也给商人发展创造了从来未有过的机会和条件。在这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是脍炙人口的，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后来几乎就成为了欧洲人对中国最普遍的看法。

当中国历史进入到明朝的时候，中国的传统社会也便走到了它的尽头。明朝社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前后的截然不同。它的前期处于传统社会的最成熟时期，它的后期则成为中国自身近代化的开始。明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外部来讲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的倭寇，从内部讲主要是流民、吏治和晚明时代的社会纵欲思潮，而明朝内部问题大都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处理而使明朝最终陷入了不能自己解决的地步。不过晚明社会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展现出了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商人与商帮。正是以商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开始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发展到头来还是被明朝自身破坏了。商品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贫困地区形成鲜明对照，并且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明朝从安置流民开始，最后由流民起义而告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由东北入关而主宰统一中国的清朝，成为中国真正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开始。这也许应该算是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同时在这个传统与近代化相交织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与现在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官商，例如人口，还有吸毒和秘密社会，再有便是人所共知的八旗子弟的问题等等。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清代的社会史研究最具条件，也最有现实感。社会史学者在田野考察中得到的资料可以与史料起到互补作用，这也就使得清代社会史比任何时代都更加生动。

三

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历史，真正能够作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从商朝开始的，从那时候起，甲骨文出现，人们从那些甲骨上的文字中证实了史书中对于商朝历史的记载。当然，随着考古发现，我们对人类历史活动的了解还会有所发展。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但是史学家们从考古与文献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历史上，至少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文明社会，或者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了家庭和国家。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而在历史上人们以史为鉴的习惯似乎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就是常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是说给历代帝王们的，目的是让他们吸取历史上的亡国教训。但是应该说，这只是以史为鉴的一个最表层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在这种政治表象之下，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社会原因。秦国的商鞅变法，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要通过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但是奖励耕战的结果是造就了军功新贵族，也就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构成。明太祖看到民不安于农耕，于是下力气改变元朝以来的重商，而推行重农抑商的

政策，从而使明朝前期的商品生产受到明显的限制。最终导致商业行为的贵族化，形成势力强大的官商集团，于是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发生了叶淇变法，将原有的种种限制改变而适应商人们的要求。这些过去我们习惯于作为政治变化的事件，其实更深层的内容都与社会问题有关。这也就是社会史的史鉴作用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层面，不同的社会问题，早已为现代人所关注。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给予重视的社会现象，很可能最终发展成为无法挽回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问题；一个政治体制造成社会现象，最终还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行业腐败。因此，很可能有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感觉到的社会问题将来会造成对社会的危害。我们编写这样的一部社会史的史鉴书，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希望唤起人们对历史上的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既包括那些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感觉到了的社会问题，也应当包括那些目前也许我们还没有看到或者感觉到的社会问题。

目 录

前言	(1)
周代的朝觐礼	(1)
走出宗法制的帷幕	(55)
秦汉大一统与交通的发展	(81)
秦汉御边对策之得失	(102)
秦汉之际社会层面变动的新格局	(123)
秦汉之际游侠的活跃与消沉	(147)
秦汉的徙民与流民	(170)
郡国制与西汉同姓诸侯王的兴衰	(195)
汉代灾害问题及对策	(222)
“士庶天隔”的魏晋南北朝门阀与等级社会	(246)
坞堡壁垒中的魏晋南北朝社区	(264)
魏晋南北朝的家庭、婚姻和宗族	(278)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崇奢与尚俭	(294)
隋唐五代的生态环境	(309)
隋唐五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332)
隋唐五代的官场与社会	(365)
隋唐五代的女性	(394)
隋唐五代的社会阶层	(419)
宋代的宗族自救	(448)
道君皇帝与宋代的道教崇奉	(470)

积弱与奢靡并存的南宋畸形社会	(490)
辽夏金乱世与宗教迷信的盛行	(508)
元代伦理道德与社会禁约	(518)
明代的流民与社会动荡	(541)
明代的流民与城镇	(561)
商品与明代社会	(586)
明代的商人与商帮	(605)
明代的通海者	(630)
畸形的明代宫廷社会	(657)
晚明社会的纵欲思潮	(693)
妓女与晚明士大夫	(714)
明清的蠹吏	(733)
人口大国与清代人口问题	(787)
清代的皇商与官商	(809)
清代婚姻关系透视	(823)
清代八旗子弟	(839)
清代的吸毒与禁毒	(862)
流人与清代的流人社会	(899)

周代的朝觐礼

礼仪是周代社会的黏合剂，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几乎无不讲究“进退周旋，莫不中礼”，而朝觐礼又属于各种礼仪中最为隆重者之列。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交往礼仪，是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联系交流的重要渠道，也可以说是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的润滑剂，其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不可低估。周代礼仪盛行，就是孔老夫子所慨叹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贵族中人也常常对于礼仪乐而不疲，习礼、研礼几成一种社会风气。看一看周代的觐礼，可以窥见周代社会风气的一斑，也可以从而看到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中礼仪的实际作用。

一、钟鸣磬响中的朝觐礼

朝觐不仅是周代各国诸侯间最为重要的外交活动，而且也是各个诸侯国内部贵族间进行联络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此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朝觐是周代颇具时代特色的礼仪。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朝觐礼的历史发展与社会作用问题。

召见或接见臣下以及方国首领的“朝觐”，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相传舜的时候，“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

以功，车服以庸”^①，就是指舜每五年要巡守一次，其间的四年各方国首领要前来朝见舜。在朝见的时候，舜要让各方国首领充分发表意见，然后根据其言论考察其功业，再根据其功业来赏赐车马衣服给他们。商代的朝觐或称为“见”，陕西长安县大原村所发现的《乙卯尊》铭文载“乙卯，子见才(在)大(太)室，白口一，口琅九，(又)百牢。王商(赏)子黄瓚一，贝百朋。子光商(赏)口贝，用乍(作)已……”铭文中的“子”为爵称，作器者某人为其下属。铭文载乙卯这天，子到太室朝见商王，并且随商王享祭于太庙，以九件玉珥和其他的物品，再奉上百牢为祭。朝见完毕，商王赏赐子黄瓚一件和贝百朋，子便赏赐作器者若干个贝，作器者以此为荣，故铸此尊表示纪念。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商代臣下朝见商王要在“太室”进行，并且要在商王的率领下享祀于太庙。这种朝觐之礼与周礼是有所区别的。

周初在修建雒邑的时候，周公曾经前往视察，“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②。可见周初就已经有了朝会的形式。伪古文《尚书·周官》谓“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从后世文献所载周代朝会的情况看，此说与周制当相距不远。周代诸王或命大臣出巡，在巡视途中，命相近的诸侯方国前来朝见。本世纪初在陕西岐山县发现的《太保玉戈》铭文载：

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命)太保眚(省)南或(国)。帅
汉，出殷南，令(命)濮侯辟，用口走百人。

铭文的意思是，在六月的丙寅这天，周王在丰地命令太保召公巡视南方。太保沿着汉水巡视，并且在南方殷见诸侯，还以王命而以名仆御封赏给濮侯。这是周王朝重臣，到南方殷见诸侯而举

① 《尚书·尧典》。

② 《尚书·召诰》。